中国差异化分层经略东南亚国家探析*

——基于结构与局势及其互动的二元分析框架

高　程　王　震

【内容提要】　经略好周边地区是中国成功快速发展的关键,东南亚地区则是周边经略的重中之重。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及其与中国互动的复杂性,基于双边关系的差异经略策略最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战略资源提升经略质量。作者就中国如何差异化地分层经略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一个长期与中期、历史与现实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针对性的经略策略。这一框架借鉴了年鉴派的历史时段法,根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的历史与现实,提炼出领土争议、国内政治稳定性、对外安全需求、对外经济依赖这四个中时段局势变量以及对华历史认知、宗教哲学认同、族群政治、华人华侨这四个长时段结构变量。局势性变量对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具有直接作用,它们决定着中国深度经略该国的可行性,但改变空间相对较大。结构性变量对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具有间接作用,它们更多影响经略该国的难度,但是影响持久且不易改变。两个维度的变量之间又存在互动关系,加强或减弱中国经略该国的空间和难度。根据这一框架,我们将东南亚十国作为研究案例,根据它们对中国发展的可能作用以及经略的可行性与难度,进行分层并确定相应的经略重点和策略。对"助益型"国家应重点深耕,对"无害型"国家应以维持现状关系为主,对"两面型"国家需要特别争取和针对性精耕细作,对"风险防范型"国家则要适度提防可能风险。

【关键词】　中国周边经略;东南亚;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

【作者简介】　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9)12-0069-32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本研究得到亚洲区域合作思想库网络研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ZYJ2019010)。

一 引言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国需要对冲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不对称依赖。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对中国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习近平在2013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①周边地区既是中国经济辐射的主要区域,也是战略安全缓冲带。经略好周边不但能为中国国内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更能助力中国积累实力以应对域内和域外大国的压力和竞争。这不但是中国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竞争与合作的基础,更是中国实现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② 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深水区,提升中国经略周边的质量正是中国进一步成功发展的关键。

相比中国周边其他区域,东南亚地区从经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说都是周边经略的重中之重。东北亚地区在区域内外大国的直接干预之下,传统安全问题尚未解决,不但长期受朝核问题困扰,而且直接面对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的两个核心盟国,短期内中国系统经略这一地区的空间有限。中亚地区是中国唯一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的传统战略辐射区域,绕开俄罗斯、过度深入这一地区可能触发两国战略摩擦,阻碍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南亚地区长期处于中国战略定位中的“次要”方向,③中短期内系统经略该地区尚未提上日程。东南亚地区无论是自身环境还是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等方面联系的密切度与成熟度,其战略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当前对其经略的可行性和空间也最大。如何提升互动质量、经略好这一地区也是当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关切。

中国以往经略东南亚地区的一揽子一体化合作模式因“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陷入长期胶着状态、难以实现深度合作,④东亚多边一体化合作方式也难有突破。比较而言,推进双边合作更能够发挥中国的相对优势,打破现有合作困境。⑤ 鉴于东南亚国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日。

② 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58—78页。

③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08—130页。

④ 关于东亚地区制度过剩和“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参见Masahiro Kawai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EAN+3 or ASEAN+6: Which Way Forward?” ADB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77, 2007, p.22,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56716/adbi-dp77.pdf,访问时间:2019年10月3日;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 ——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⑤ 韩彩珍、时殷弘:《东亚区域合作的瓶颈问题与中国》,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2期,第32—36页。

家自身的多样性及其与中国互动的复杂性,要想高质量地经略东南亚国家,中国应避免无差异推进或者以中国—东盟的一对多模式展开。这就要求中国区别与东南亚国家在双边关系上的不同性质,推进多层次、差异性的经济外交策略。①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并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应如何对东南亚国家分层和排序,从而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经略策略。

二 现有研究评述

分层次、差异化地经略东南亚国家的基础是从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多样性及其对华政策、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度中提取相关变量,分析深度经略的可行性和难易程度。现有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和中国经略东南亚策略的研究视角多样、侧重不同,既有对单一国家、单一要素的深入分析,也有涵盖整个地区的系统性分析。关于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和双边关系,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国别研究、区域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

东南亚的国别研究通常以一个或多个要素为主要变量深入探讨某个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逻辑。例如,在对越南的研究中,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强调"非对称性"的结构性作用,认为非对称性这一特征决定了越南对华政策的选择以及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走向。② 相似的研究路径在对泰国、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中同样大量存在。通过对泰国对华政策的对比分析,孙学峰等人认为泰国在应对中国快速发展时的反应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更加温和。迈克尔·瓦迪基奥蒂斯(Michael R. J. Vatikiotis)从经济视角出发分析了中泰关系,认为由于受经济利益的影响,泰国越来越接近中国。③ 印尼学者艾哈迈德·哈比尔(Ahmad Habir)等人深入探讨了印尼国家价值观、国内内部机制等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上述因素是决定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④ 另一位印尼学者黎萨·苏克玛(Rizal Sukma)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

① 高程:《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性》,载《国际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35—48 页。

②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孙学峰、徐勇:《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载《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80—96 页。

④ Ahmad D. Habir, *Indonesia's Ascent: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Regional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华人华侨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积极作用。① 单一东南亚国家视角下的研究成果甚丰,本文不再逐一列举。

对东南亚国家的国别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单个或多个要素在该国与中国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这些研究对双边关系的讨论也为本文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不过,由于缺乏横向对比,上述研究无法对东南亚各国的重要程度、经略的可行性和难易程度做出系统性分析,遑论分类与排序。特别是以某一国家为长期研究对象的文献,虽然它们能够深入分析该国与中国关系的演进,但其通常会在缺乏系统对比的情况下,仅从单个国家的经验出发探讨中国是否应大力经略该国。

区域系统研究部分弥补了国别研究的不足。这类研究多以整个或多个东南亚国家为分析对象,通过设定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以单一要素为分析变量考察不同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以此划分东南亚国家的类别。地缘政治学者重视地理位置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往往将其作为划分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指标。这些学者受权力转移的传统历史叙事的影响,将大国竞争视为海上霸权和陆上霸权之间的博弈。陆伯彬(Robert S. Ross)将这一观点运用到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东南亚地区,以地理位置为划分标准将东南亚国家分为海上东南亚和陆上东南亚,认为两者将分别由中美两国主导。② 在其他研究中,用于将东南亚国家分类的单一变量还包括领土争端、③同盟关系④和华人华侨"⑤等因素。

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以及长期以来它们与中国互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维度的分析路径难以对东南亚国家做出系统分类和排序。目前多变量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分

---

① Rizal Sukma,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Engagement," *Asian Survey*, Vol.49, No.4, 2009, pp.591-608.

②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15, No.3, 2006, pp.355-395;聂文娟:《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 年第 3 期,第 90—112 页。

③ 参见 Chien-pen Chung,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London: Routledge, 2004;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王峥:《冷战后南海周边主要双边关系研究——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中马差异性关系探究》,北京:外交学院 2017 年博士学位论文;漆海霞、齐皓:《同盟信号、观众成本与中日、中菲海洋争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108—136 页。

④ 聂文娟:《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 年第 3 期,第 90—112 页。

⑤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6, 1993, pp.926-948; Liu Hong, "Opportunities and Anxieties for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115, No.784, 2016, pp.312-318;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1, No.1, 1987, p.135;周聿峨、龙向阳:《华人华侨与国际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析框架侧重对比东南亚国家的对华策略选择。冷战之后,关于未来东亚的走向一般有趋于竞争、均势和等级体系三种观点,东南亚国家的对华策略选择也存在制衡、对冲和追随三种不同的判断。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研究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他以与中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为判断标准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六个不同阵营,根据由远到近排序为:印尼是"局外人";越南、新加坡是"制衡的对冲者";菲律宾、文莱是"倾斜者";马来西亚、泰国是"一致、妥协者";缅甸、老挝是"重生者";柬埔寨是"投降主义者"。① 沈大伟虽然以对华亲疏远近为指标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排序,但并没有设定排序标准,只是在注释中提及是根据各个国家与中国军事、经济关系的主观判断和认知来分类。在操作层面,他也没有给出可供实证案例检验的分析框架。

相比沈大伟的研究,郑在浩(Chung Jae-ho)、丹尼·罗伊(Denny Roy)等学者在指标选取方面更为严谨。郑在浩以是否与美国结盟、是否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和政权特征三个要素为判断指标,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划分为制衡、对冲、追随等不同阵营。在他的研究中,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对中国奉行追随策略,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为积极对冲,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则为消极对冲。② 罗伊以经济安全、南海问题、历史关系等为指标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分类,认为泰国属于经典对冲,新加坡、菲律宾是公开的低烈度制衡,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维持微妙或高度克制的制衡,缅甸则选择追随。③ 陈宗彦(Ian Tsung-Yen Chen)和杨浩(Alan Hao Yang)则根据"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指标将东南亚国家划分到四个象限:缅甸、柬埔寨、文莱为追随,越南、菲律宾、印尼为软制衡,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泰国为对冲。④

这些研究以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策略作为划分标准,搭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和策略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⑤ 但由于研究范式、路径、变量选取以及判断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上述研究的结论偏差较大。在对多个变量分析处理的过程中,以上研究更多是单一维度的罗列,缺乏变量之

---

① 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2, No.4, 2018, pp.85-127.

② Chung Jae-ho,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82, No.4, 2009, pp.657-675.

③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7, No.2, 2005, pp.305-322.

④ Ian Tsung-Yen Chen and Alan Hao Yang,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26, No.3, 2013, pp.265-288.

⑤ 相关研究参见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1 期,第 67—90 页;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载《当代亚太》,2017 年第 2 期,第 6—37 页。

间的分层以及对变量间互动和逻辑关系的深入分析。从研究目的来看,以上研究多将对东南亚国家的分类而非对其经略方式作为最终落脚点,并未进一步分析中国应该如何经略东南亚国家。此外,以上变量大多是属于单纯的国际关系视角,聚焦于当下的经济、安全状况,对历史的长时段结构要素关注不足,因而其分析框架缺乏立体感和层次感。

与前两类研究相比,现有的立足历史性分析视角的研究多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往来互动。这种分析既有针对某一专题的考察,也有多领域、长时间的对比。专题性研究或从单一维度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析和归纳,或勾勒具体国家的历史演进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古代中国的交往。① 以整个东南亚地区为分析对象的著作则通常会系统梳理作为一个地区的东南亚的历史演进。② 对东南亚单一国家或区域的历史性研究为理解当下东南亚、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时间维度上的分析,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但这类分析大多立足于传统的历史学分析方法,侧重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和线性描述,无法就历史对当下双边关系的影响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在系统性方面也稍显薄弱。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有三点不足:一是更多将东南亚国家的差异化作为结论,缺乏对差异化标准的实证探讨,未能将多个变量纳入同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内予以解释;二是在指标或参数选取方面通常聚焦于短期范畴和当下的可视变量;三是大多停留在解释东南亚国家的不同对华策略反应,缺少对中国如何针对性地系统经略这一地区的战略分析。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将立足中国当前经略周边的现实需要,构建一个系统的分层差异化经略东南亚国家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同时强调东南亚国家自身及对华历史和当前大国对其影响,从"长时段结构"与"中时段局势"以及二者互动的视角解析中国经略东南亚各国的可行性和难度,针对不同类别的国家制定有效和可操作的经略策略。

---

① 参见贺圣达:《缅甸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大卫·钱德勒著,许亮译:《柬埔寨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年版;Rizal Sukma, *Indone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London: Routledge, 1999;施坚雅著,许华等译:《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案例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2 年版;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参见梁英明:《东南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尼古拉斯·塔林著,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Amitav Acharya, "Imagined Proximities: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as a Region,"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27, No.1, 1999, pp.55-76。

三 经略东南亚国家可行性与难度的二元分析框架

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演进既是现阶段彼此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深受长时段历史影响的动态过程。由于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差异,中国与不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和影响要素存在明显差异。当我们试图理解其背后的动机、机制和条件时,不但要关注当下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也需要将目光回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探寻长时段的历史性结构因素对当下双边关系的作用。在部分借鉴年鉴派时段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我们重新界定了"长时段结构"和"中时段局势",并对影响中国经略东南亚国家的要素进行层次上的划分。

对影响要素的划分有利于明确中国经略东南亚国家的可行性和难易程度。中时段局势这一变量是指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使双边关系存在持续性和波动性的要素,对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认知具有直接作用。它决定着中国深度经略该国的可行性。结构性变量对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认知具有间接作用,其影响持久且不易改变,它更多影响的是经略该国的难度。中时段局势变量与长时段结构变量又存在互动,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决定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经略的空间和难度。

(一)当前与未来的中时段局势变量

局势性变量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中的约束性条件和关系,直接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应对和中国在该国深度经略的可行性,也是触发各类突变的深层动力机制。局势性影响因素突出表现为领土争议、对外安全需求、对外经济依赖以及国内政治稳定性这四个变量。

第一,与中国的领土争议。如果该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则为负向因素;若其受到结构变量或其他局势变量影响上升为领土争端或冲突,则为强负向因素。领土争端被认为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最主要原因。约翰·瓦斯奎兹(John Vasquez)通过分析1816—1992年的战争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领土争端比其他类型的国家间争端更有可能导致战争。[①] 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南海主权争议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航道的地位使得这一问题愈加复杂。南海争议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持续存在,是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局势性变量。

① John Vasquez and Marie T. Henehan,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ar, 1816-199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8, No.2, 2001, pp.123-138.

第二,安全需求和对外安全依赖。如果该国安全依赖中国,为强正向因素;如果安全依赖美国或其他竞争国,则为强负向因素。小国的安全需求和自身能力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为了填补这一鸿沟,小国往往会采取联盟、中立、自助(核武)以及集体安全等战略手段,这对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会产生持续性影响。① 安全需求作为高政治议题,往往是小国的首要关注,其对大国的安全依赖关系往往比其他关系更为重要和牢固。当国家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政治不发生根本性变革时,一国对大国的安全需求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持续性。东南亚国家为满足自身安全需求而产生的战略差异会直接影响自身对外政策的制定,并且对各类双边关系和地区秩序产生持续影响,这在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各个国家的对华政策中有明显体现。② 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对外部大国的安全依赖将显著影响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

第三,对大国经济的不对称依赖。如果该国经济不对称地依赖中国,为正向因素;如果经济不对称地依赖美国或其他竞争国,则为负向因素。对大国的经济不对称依赖关系要比安全依赖关系的影响要弱,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具体影响程度也会随敏感或脆弱依赖的程度而有所差别。小国与大国之间的经济不对称依赖会使大国从这种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中获得一定的"权力资源",③至少在经济领域对对方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四,国内政局和政治稳定性。如果中国可予以影响,为正向因素;如果美国或其他竞争国可介入或予以影响则为负向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的研究不断推进,指出国内政治特别是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博弈会显著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④ 基于这一逻辑关系,国内政治的变动将对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有根本性影响,这种影响在大国竞争激烈的地区还会更加明显。中小国家的国内政治冲突很容易"外溢",为大国的外部干预提供了可能;其政府为了增强政权合法性,同样会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这就为外部国家特别是大国对地区小国施加影响和干预提供了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区域内国家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否将在很大

①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6—306 页。

② 菲律宾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如此强硬,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是重要变量。参见 Jihyun Kim,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mplications for Security in Asia and Beyond,"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9, No.2, 2015, pp.107-141。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13 页。

④ 参见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和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程度上影响其与外部国家的关系和地区局势。

(二)历史的长时段结构变量

历史的长时段结构变量没有局势变量的作用直接,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反应更多起到间接作用,但它们是长期持续的作用因素,能够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深度经略的难度。而且,如果中时段局势性变量受到长时段结构性变量的影响,那么前者对东南亚国家对华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会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这类结构性变量包括对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和双边关系的历史认知、宗教和哲学认同、族群政治和华人华侨。

第一,历史认知。古代中国在东亚是主导国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历史认知有两个层面:一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东南亚国家对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认识。这一历史话语在当下被对"朝贡体系"高度警惕的国家解读成中国试图控制地区的尝试。二是对双边关系中具体历史的现代解读,通过历史教育的宣传,形成东南亚国家社会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认知。如果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负担和忧虑,历史往往会被消极地政治化,成为负向因素。

第二,宗教和哲学认同。价值观因素在东南亚地区的体现主要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民主制度认同,而是宗教哲学领域的认同。宗教因素在东南亚政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也是理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哲学因素会影响东南亚社会和国家决策者的世界观,特别是对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心态,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和这些国家在共建地区秩序过程中的沟通和理解彼此行为模式的成本。东南亚地区受佛教和儒家影响较深的国家与中国在宗教哲学上更有认同感,总体是正向因素;如果宗教哲学的世俗化程度较高、对政治影响较弱,那么尽管其对中国的价值理念认同有限,仍然可以呈现为中性因素;如果主要宗教哲学极端化、政治化,那么就会降低彼此间宗教哲学体系的相容性,增强对立性,表现为负向因素。

第三,族群政治。族群政治在东南亚政治中的作用长期存在,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的族群政治在历史上都导致过分离运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本质上也是族群政治问题。东南亚国家族群政治中的历史性问题直接影响了两个局势性变量——政治稳定性和对外安全需求。

第四,华人华侨。之所以把这个变量从族群政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它不仅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而且华人群体在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扮演着重要的经济角色,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华人经济圈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媒介作用,促进该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同时,华人

网络的形成也可能加强这些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感知,由“排华”转为“防华”,甚至上升到“反华”政策。华人华侨变量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态度和中国的周边经略是“双刃剑”,正向和负向因素并存,而且转变空间较大,需要逐案分析。

长时段结构变量对于国家组织和社会的影响具有隐秘性和持久性。历史认知、宗教哲学、族群政治以及华人华侨这四个变量的影响无法在中短期内消除,相反还将持续对当下政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结构变量与局势变量互动的差异化分析框架

上文中我们将长时段结构变量与中时段局势变量进行了分类,阐释了它们在各自维度的作用。对于理解当下不断发生的冲突性事件而言,单一维度的解释总是不够有力。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指出的:“只有结构和局势的结合才能给出最终的解释。”①因此,我们将分析和探讨长时段结构因素和中时段局势因素间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将东南亚国家分类、排序的理论分析框架。

国家构成的复杂性使得社会在不同框架下的互动存在明显差异。经济、科技的发展固然推动国内、国际社会逐渐演变成一个网状结构,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权力的来源,政府、经济、军事和政治这四根支柱仍旧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② 这种同一性在不同的结构框架下不断地互动、重构并最终形成多样性的国家。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结构和局势的构成往往存在差异。同样,其中的互动强度和显著性也有着明显不同。

互动强度较大时往往会形成“循环效应”,对整个社会带来显著影响和变化。③ 如果两个维度的正向因素存在强互动关系,则会出现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强正循环效应”;反之,如果两个维度的负向因素存在强互动关系,那么则出现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强负循环效应”。当然,在两个维度的因素互动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并不会对国家双边关系带来显著的影响。

具体到东南亚地区,各国在两个维度上的状况并不具有统一性,复杂的社会构成也使得各国在互动层面上的强度存在差异。根据结构性变量与局势性变量的性质指标(正向—中性—负向)以及两个维度之间互动性的强弱,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构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如图 1),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四种可能类型。第一类是助益型国家:经略可行性强、难度小、收益大,是能够助益中国发展的可依靠的国家。第二类是无害型国家:争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4 页。

② 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③ 关于循环效应,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7—58 页。

取成本过高,深度经略难度大,但争取不到并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属于对中国发展无害但支持也较为有限的国家。第三类是两面型国家:经略得当能够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助益,经略不当则可能滑向对立面、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国家。第四类是风险防范型国家:深度经略的可行性小、难度大,需要特别提防其对中国发展的潜在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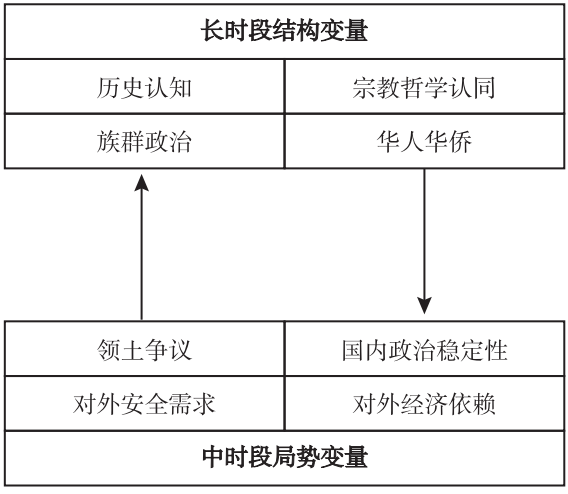


图 1　影响中国经略周边的要素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年鉴学派时段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对影响中国经略周边的要素进行了分析和归类,构建了一个长时段结构和中时段局势可以互动的分析框架,使得从理论上对国家做出必要的类别和层次划分成为可能。长时段结构变量包括历史认知、宗教哲学、族群政治和华人华侨;中时段局势变量涵盖领土争议、对外安全需求、国内政治稳定性和对外经济依赖关系。其中,长时段结构变量发挥着间接但持续的影响,决定了经略的难度;中时段局势变量更多表现为一种约束性条件和关系,它直接影响经略的可行性。两个维度中各指标的性质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强度将最终影响一国在中国周边经略中的地位和排序。

四　结构、局势及其互动下的东南亚十国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将分别考察东南亚十国在两个层面不同变量的正负性质,探讨其中的互动关系,进而做出分类和排序。

(一)越南

越南在宋代以前是中国的一部分,独立之后又与中国保持了近千年的朝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越南的统一事业提供了长期援助。但统一之后的越南在中南半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中越两国在陆地和海上有过多次冲突。在地区层面,越南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当下的迅速发展持怀疑态度,对中国在越南建立孔子学院的意图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认为其构成了对越南国家主权的挑战。① 越南在对华历史认知的两个维度上都呈现明显的负指向。

越南的对华态度除了受历史因素影响之外,两国近年来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争端以及越南国内政治中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还进一步强化了既有认知。中国与越南已经解决了陆地边界的划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但在南海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越南不仅对整个南沙群岛提出了主权声索,还对西沙群岛提出了主权要求。近年来随着越南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竞争最为激烈。② 越南共窃据 29 个岛礁,位居所有声索国之首。目前,尽管中越双方努力管控围绕南海的分歧,但两国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摩擦始终不曾间断。越南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阮庭廉(Nguyen Dinh Liem)就认为:"南海问题虽是局部问题,却决定着中越两国关系最终是友好还是敌对这一未来前景。"③因此,领土争端堪称强负向因素。

上述两个负变量之间存在强互动关系,多次引发越南国内的反华浪潮。2016 年 7 月,在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结果出炉前后,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发生多起规模不一的反华游行。④ 引发这一事件的动因是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争端,但却在越南引发了不小的骚动。这说明负面的对华认知在越南的知识精英和民众中都影响广泛,有时甚至直接影响两国政府间合作。越南政府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但领土争端与历史认知往往相互强化,形成影响越南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重要动力。

中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虽然争议较大,但与菲律宾不同,越南并未明确表示寻求外部大国的安全支持。1986 年革新开放之后,越南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91 年确定了"全方位(multidirectional)"的外交路线,主张在外交中多交朋友、少树敌。越南

---

① Liu Hong, "Opportunities and Anxieties for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115, No.784, 2016, p.317.

② Jing Huang and Andrew Billo,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igating Rough Water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9.

③ 赵卫华:《十二大之后越南政治的演变与中越关系的走势》,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149 页。

④ 《越南再起反华示威 30 余人被捕 越南政府表现克制》,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xAF,访问时间:2018 年 12 月 13 日。

近年来虽与美国密切合作,但这更多是一种对冲而非与之结盟。① 越南虽然存在对外安全需求,但其依赖的更多是大国之间的平衡而非某一个大国的支持。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水平不断提升。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越南浸染中国文化最为明显。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的理论和价值观念在越南有较大影响。在国内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越南也更多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例如越南在 1986 年就效仿中国实行革新开放,改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越南政府还重新制定了针对国内华人的政策,一改统一之后针对华人的打压,② 让华人在越南的经济发展中重新获得了较为有利的经济地位。③ 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越南华人群体未能形成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越南国内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国内政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越南连续多年稳定性指数为正。革新开放以来,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缓和以及经济往来的密切,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2017 年的数值显示中国、日本和美国在越南的经济影响力相差不大,分别为 20.12%、19.83% 和 23.43%。④因此,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拥有一定影响力,但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

越南在结构维度中存在历史认知这一负向因素,在局势维度中领土争端则是明显的强负向因素,两者之间还存在强互动关系,正向因素则相对较少并且没有形成明显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应警惕、防范越南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缅甸

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近年来缅甸国内的族群政治引发了更多关注,而中国在

---

① Michael J. Totten, "Dispatch from Vietnam: Will the US Foster a Natural Ally?" *World Affairs*, Vol.177, No.4, 2014, pp.59-70.

② Lewis M. Ster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1979-82," *Asian Survey*, Vol.25, No.5, 1985, pp.521-536.

③ Ramses Amer, "The Ethnic Chine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7, No.2, 1996, pp.449-451.

④ 双边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东盟统计年鉴》(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本文使用经济依赖的测度公式强调对市场和资金的依赖程度,其基本变量为出口额度和投资额度,具体如下:

$$P_c = \frac{E_{mc}}{E_m} + \frac{I_{cm}}{I_m}$$

在公式中,P_c 表示在不对称依赖中 c 国获得的权力,E_{mc} 表示 m 国出口到 c 国的出口额,E_m 表示 m 国的出口总额,I_{cm} 表示 c 国对 m 国的投资额,I_m 表示 m 国的总投资额。下文涉及的经济数据均与此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一致,不再赘注。

协助解决缅族群问题的进程中作用突出。自建国伊始,族群政治就成为影响缅甸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缅北的“民地武”问题以及南部的罗兴亚人问题再次凸显出缅甸族群政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北部与中国接壤,再加上历史上的联系,在处理缅北“民地武”等方面的问题时,缅甸政府需要中国的支持。① 在2018 年于缅甸举行的第三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上,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应邀出席会议,声明中国一直在做各方的劝和、促谈工作。②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新时期缅甸国内族群政治和解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议题属于正向因素。

由于长期以来的族群政治和宗教冲突,缅甸国内政治稳定性较差。根据世界银行连续几年对缅甸的统计,其稳定指数都是负值。2015 年为-1.17,2018 年稍有提升,为-1.08。③ 在维持国内稳定的过程中,缅甸政府在合法性和政策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影响涉及缅甸国内政治问题的决议。缅甸政府在处理罗兴亚人问题时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的反对和抗议,中国则曾在联合国会议上使用否决权阻止外部势力对缅甸国内政治的无理干预。④ 第二,利用中国较强的经济实力促进缅甸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发展求稳定。现阶段,缅甸的国内政治稳定需要中国方面的支持,这一议题也属于正向因素。

此外,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发展中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既是基于历史遗产,也是当下缅甸寻求国内发展的结果。自 1988 年的政治动荡以来,缅甸受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缅甸将目光投向中国,利用中国不断积累的资金和技术拓展其国内经济发展的渠道。由于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断上升,在 2010 年达到 73.88%。2011 年缅甸大选之后,外部环境大为改善,其经济发展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下降。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依旧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 年缅甸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仍然高居

① 刘务:《缅甸政治发展对中缅关系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0—33 页。

② 《缅甸第三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开幕》,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7/11/c_1123111712.htm,访问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③ 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访问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下文案例中提到的稳定指数均来自此数据库,将不再赘注。

④ 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是具体表现,投票情况参见 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session=154030Y9X949Q.51738&menu=search&aspect=power&npp=50&ipp=20&spp=20&profile=voting&ri=1&matchopt=0%7C0&source=~%21horizon&index=.VW&term=Myanmar&x=11&y=14&aspect=power,访问时间:2018 年 11 月 11 日。

52.74%,远高于对其他大国的依赖。因此,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整体上处于主导地位,属于正向因素。

客观而言,上述的主导性影响特别是中国在缅甸的经济活动也引发了缅甸国内的一些不满,这也体现在缅甸的华人华侨问题上。缅甸的华人华侨数量有限,占其总人口的 3%,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曼德勒和南部的仰光。随着中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新的移民随之而来。新移民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导致缅甸国内部分地区民众对大量华人的存在表示担忧和不满,认为中国人可能会扮演近代英国殖民者的角色,攫取缅甸的自然资源。① 整体上看,华人华侨议题在缅甸应属于中性因素,政治影响力有限,但在缅甸部分地区有恶化的趋势。

除了政治、经济之外,中缅两国在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缅甸为传统佛教国家,佛教信仰占据主导地位。② 目前佛教徒占缅甸总人口的 87.9%,佛教影响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在宗教领域,中国佛牙的巡礼是中缅宗教交流的典型案例,③ 这方面大体属于正向因素。回顾两国的历史,中缅两国曾经发生过多次冲突和战争,东吁王朝就是在元朝的打击下灭亡,而到了清代又发生了清缅战争,双方交战多年。④ 进入新中国时期,由于两国较早确定了边界,不存在领土争议,缅甸在中国突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也长期支持缅甸的国内建设,特别是在军政府时期,但是这也影响了缅甸民众的对华评价。⑤ 在地区层面,缅甸同样对中国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综合考虑,历史认知应为中性因素。

虽然缅甸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但在安全上依旧保持独立自主。缅甸自独立以来就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冷战初期就表示不希望受冷战格局的影响,毅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受西方制裁时期,缅甸奉行的“中立主义”政策虽然发生倾斜,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目前由于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缅甸的安全获得了更大保障,但其在安全上并不依赖外部大国,在加入东盟之后就更是如此。因此对外安全需求为中性因素。

---

① Mya Maung,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nization of Upper Burma,” *Asian Survey*, Vol.34, No.5, 1994, pp.447-459.

② Bertil Lintner, *The Resistance of the Monks: Buddhism and Activism in Burm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9;张蕾:《缅甸政治转型期的佛教民族主义——宗教能力和政治需求的互动联盟》,载《南亚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10—128 页。

③ 黄云静:《中国对东南亚的佛教交流》,载《公共外交季刊》,2011 年第 8 期,第 21—27 页。

④ 贺圣达:《元明清时期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14 页。

⑤ Tin Maung Maung Than, “Myanmar and China: A Special Relationship?”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3, pp.189-210.

在长时段结构维度中,宗教哲学、族群政治在缅甸的对华政策上为正向因素,其他为中性变量;在中时段局势维度中,领土争议、对外安全需求为中性变量,其他为正向因素。在两个维度中均不存在负向因素,且族群政治与国内政治稳定性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强互动关系,构成强正循环效应。

(三)老挝

近年来老挝的民调数据显示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评价较为中肯。① 这种积极正面的评价一方面是源于老挝与中国在宗教哲学上存在较大的相通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中老两国的往来历史久远,由于跨境民族的存在,双方政府、民间层面交往频繁。南传佛教在老挝占据主导地位,中老两国一直保持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沟通。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老挝开始新经济机制改革,泰国和中国的资本开始进入,老挝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泰国和中国。对泰国,老挝主要依赖其电力市场,②对中国则是需要资本和商品市场。因此,历史认知和宗教哲学均属于正向因素。

目前中国在老挝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性影响地位。柬埔寨危机之后,中老双方政治关系得到缓和,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进入快车道。③ 2017 年,中老两国签署《关于共建中老经济走廊的合作框架》,④该协定的签署使中老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2019 年《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签署使老挝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与中国签署该类协定的国家。⑤ 近年来,中老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使得两国关系不断深化。2016 年老挝对中国市场和资金的依赖程度达到 102.12%。换言之,在老挝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市场和资金占据一半以上。在老挝,在对华经济依赖是突出的正向因素。

与经济领域相比,中国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明显弱于越南。老挝是中南半岛的小国,泰国、越南长期主导老挝的外交事务。两国对老挝的竞争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泰国和越南对中南半岛地区主导权的竞争既是权力竞争的表现,也被乔治·赛代斯(George Cades)等学者视为"文明冲突"的典型案例。⑥ 历史上,老挝的政治走向随着

① 本文中提到的民调具体数据的来源参见 https://www.mofa.go.jp/policy/culture/pr/index.html,访问时间:2019 年 3 月 20 日。下文中其他案例中提到的民调数据均出自这一出处,将不再赘注。

② Thongphet Lamphayphan, et al., "Export Supply of Electricity from Laos to Thailand: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5, No.2, 2015, pp.450-460.

③ Martin Stuart-Fox, "Laos: The Chinese Connectio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9, pp.141-169.

④ 《中老签署联合声明 将共建中老经济走廊》,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4731.htm,访问时间:2019 年 9 月 15 日。

⑤ 《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01/c_1124440753.htm,访问时间:2019 年 9 月 15 日。

⑥ G.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泰国、越南两国的实力消长而来回摆动。在 1975 年巴特寮夺取政权之后,泰国的影响力被清除,越南在老挝政治进程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977 年老越签署友好同盟协定,老挝倒向越南,两国构建了“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两国之后的政治交往中得到延续。不过,随着中南半岛区域合作的开展,特别是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相对于越南和泰国在国力上的明显优势,老挝在外交层面开始寻求维持平衡而非倒向某一国家。维持各方的平衡状态既是老挝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也是最大化国家发展利益的有效路径。受限于自身实力,倒向任何一方都将使老挝不可避免地处于“被主导”的地位,威胁国家的独立自主。此外,鉴于有利的地缘区位优势,保持外交中立将使老挝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资源。通过维持中国、越南和泰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老挝成功地引导了地区竞争,为该国带来了巨大收益。① 由于被中国、越南和泰国围绕,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除了越南和泰国这两个中南半岛次区域强国和中国之外,老挝受其他域外大国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

老挝能够维持外部平衡也得益于近年来稳定的国内政局。老挝民族构成复杂,北部的山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可度有限,但是他们自身的政治参与同样有限,没有造成较大的政治波动。除了冷战时期王宝领导的苗族政治运动曾经对老挝的国内政治带来冲击之外,其他时期并未产生持续性的显著影响。② 在老挝的华人相比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数量较少,政治作用有限。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一党执政的背景下,其他政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有限。从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老挝的政治稳定性较强,对中国发展而言属于中性因素。

可以看出,在结构和局势两个维度的诸多变量中,老挝对于中国而言并没有明显的负向因素,正向因素还在不断增多,并且两个维度的正向因素之间互动较为密切。近期中老两国又决定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这对于中国进一步走入中南半岛提供了机遇。鉴于老挝在连接泰国、构建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的重要作用,老挝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助益性也在进一步提升。

(四)柬埔寨

柬埔寨独立之后,高棉人占总人口的 97.2%,属于绝对的主体民族。③ 华人华侨

① Christopher B. Roberts, “Laos: A More Mature and Robust Stat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2, pp.153-168.

② Norma J. Livo and Dia Cha, *Folk Stories of the Hmong: Peoples of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London: Libraries Unlimited, 1991.

③ Ramses Amer, “Cambodia's Ethnic Vietnamese: Minority Right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34, No.3, 2006, pp.388-409.

在柬埔寨数量有限,只占其人口的 0.3%,并且未能形成参与政治的政党集团,更多是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① 因此,历史上柬埔寨也较少出现针对华人华侨的大规模排斥运动。两国长期以来交往密切。

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交流较为频繁、内容丰富,尤其是贸易往来较多。元朝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社会的诸多方面,是研究古代柬埔寨的重要资料。根据统计,古代中柬两国的官方往来从东吴到明时期共达 70 余次,在明时期更是达到 24 次之多。频繁的往来交流一方面是朝贡贸易,另一方面是佛教文化交流。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柬埔寨的发展给予了长期、大量援助。就双边层面而言,中柬两国没有发生过战争,中国多次支持柬埔寨独立;就地区层面而言,柬埔寨较少担忧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主导。③ 这一点在柬埔寨的总体对华认知中也有体现。因此历史认知属于正向因素。

宗教在柬埔寨社会的对华友好认知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中国的云南地区与柬埔寨同属于南传佛教文化圈,两地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频繁。柬埔寨国内佛寺林立,民众对于佛教保持着较为虔诚的信仰。在柬埔寨,佛教对国家的影响涉及各个方面,佛教和僧侣在柬埔寨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佛教影响下甚至衍生出“佛教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④ 佛教对柬埔寨的影响也涉及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化、习俗、艺术等领域都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这使得柬埔寨与中国在宗教哲学和价值体系方面存在较高程度的契合。

宗教哲学体系的相容并不必然促进对华认知的改善,柬埔寨的国内政治需要是构建对华积极认知的重要动力。洪森(Hun Sen)领导的人民党主导柬埔寨的国内政治已经 20 余年,奉辛比克党和桑兰西党这两个党派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柬埔寨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洪森政府对反对党领袖桑兰西(Sam Rainsy)、金速卡(Kem Sokha)等人的指控使得反对党力量大减。⑤ 世界银行近三年来的数据也显示柬埔寨国内政治相对稳定。柬埔寨国内的稳定建立在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1991 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柬埔寨危机的解决,自此进入国内发展的新阶段。柬埔寨的发展起步较晚,依赖外部投资和市场,而这些正是中国的相对优势。目前中国在

①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2 页。

② 周玥珊:《古代中国和柬埔寨海上交流的特点》,载《南都学坛》,2016 年第 4 期,第 119—120 页。

③ Robert S. Ross, “China and Post-Cambodia Southeast Asia: Coping with Succes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19, 1992, pp.52-66.

④ 李晨阳:《佛教在当代柬埔寨政治中的作用》,载《东南亚纵横》,1995 年第 4 期,第 46—51 页。

⑤ Sebastian Strangio, *Hun Sen's Cambodia*, Cornwall: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中拥有重大影响,2014 年中柬两国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占柬埔寨对外贸易和投资总额的 37%以上。柬埔寨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这属于正向因素。

除了经济方面的依赖,柬埔寨在对外安全需求上也明显倒向中国。柬埔寨地处地区强国泰国和越南之间,与这两个国家都存在领土争议。柏威夏寺庙归属之争是柬埔寨与泰国之间最为突出的领土争端,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核心问题。越南则是柬埔寨的主要威胁,历史上越南多次入侵柬埔寨,目前两国之间存在较大的领土、领海争议。因此,从次区域安全而言,柬埔寨需要域外大国的支撑,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洪森政府持敌视态度,使得中国成为最佳选择。中柬两国的历史互动也证明了这一点。① 柬埔寨在东盟峰会上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就被视为其"倒向中国"的重要标志。因此柬埔寨的对外安全需求属于强正向因素。

独立以来,柬埔寨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使得历史认知与安全依赖形成强正循环效应。此外,其国内政治稳定与对华经济依赖之间也同时形成了正循环。柬埔寨民众对中国较为正面的认知以及历史上中国在柬埔寨维持独立地位时的战略作用决定了柬埔寨对中国的战略选择。这种强互动关系也表现在近年来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择。② 综上所述,在长时段结构和中时段局势两个层面,柬埔寨都不存在针对中国的负向因素,正向因素则较多,并且存在强互动关系。柬埔寨是中国迅速发展进程中需要重点深耕的国家。

(五)泰国

在双边层面,历史上泰国与中国并未发生直接冲突。相反,18 世纪 60 年代的清缅战争反而有利于泰国从当时缅甸的占领中恢复独立和实现重建。③ 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泰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处于敌对关系。1979 年的柬埔寨危机成为改善中泰两国关系的契机,之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在地区层面,历史上泰国虽然长期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但泰国更多是从经济层面解读这一关系,因此泰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认知较为温和。④ 由于中泰两国并不存在领土争议,直接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有限,再加上两国宗教、文化等方面不乏相通之处,所以 2017 年的民调数据显示,泰

① Sigfrido Burgos and Sophal Ear,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Cambodia: Influence and Resources," *Asian Survey*, Vol.50, No.3, 2010, pp.615-639;马丁·斯图尔特·福克斯:《东南亚和中国:历史和文化对形成未来关系所起的作用》,载《南洋资料译丛》,2005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② 《柬埔寨重申不支持南海仲裁》,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7/10/c_1119193036.htm,访问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

③ 周郢:《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载《历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179—187 页。

④ 孙学峰、徐勇:《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载《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80—96 页。

国民众在中、美、日三国中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达到 70%。①

但泰国对华的好感度与中国对泰国安全和经济发挥的作用并不匹配,美国和日本分别在泰国的安全和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尽管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放弃了在泰国的乌塔保军事基地,但盟友关系一直存在,相互之间缔结了情报共享协议。泰国与美国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双方的盟友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存在。② 在经济层面,尽管中泰经济合作不断升温,但日本对泰国的重视及其长期经略使得泰国在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较高,并且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8—2016 年中、日两国与泰国的经济关系来看,日本是明显更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方。

虽然中国在泰国的经济和安全领域处于相对弱势,但华人在政治层面的表现较为突出。由于泰国实行较为温和的华人华侨政策,华人华侨在泰国社会的融入较为成功。正因为如此,目前泰国华人华侨的数量难以统计。在泰国国内政治中,拥有华人血统的政府官员大量存在,甚至成为总理。从历史上的郑信大帝(Somdet Phra Chao Taksin)到当代泰国总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英拉(Yingluck Shinawatra)等,华人血统在泰国政治中普遍存在,也很少受到泰国民众的抵制。华人之所以能较好地融入泰国社会,与两国在宗教信仰上具有相通之处密切相关。泰国与老挝、缅甸、柬埔寨一样为南传佛教国家,目前佛教徒占人口的 94.6%,因此也被称为“黄袍佛国”。③

与华人的积极融入相比,泰国南部的族群问题是影响泰国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泰国南部四府的部分族群多年来煽动分离主义,希望南部四府加入马来西亚。④ 近年来由于极端势力的增长,泰国南部族群冲突时有发生。⑤ 这一族群冲突加上军事政变这一“政治诅咒”,导致泰国政治稳定性较低。长期以来,泰国令人诟病的主要问题就是军人和文职政府之间的交替,每隔数年泰国就会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再通过选

---

① Hsin-Huang M. Hsiao and Alan H. Yang, “Differentiating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y: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Cambodia and Myanmar,” *Issues and Studies*, Vol.50, No.4, 2014, pp.11-44.

② 曹筱阳:《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机制及其前景》,载《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49—55 页。

③ S. J. Tambiah,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④ Angel Rabasa and Peter Chalk, “Muslim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in Angel Rabasa and Peter Chalk, eds., *Indonesia'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Southeast Asi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1, pp.85-98.

⑤ Michael K. Jerryson, *Buddhist Fury: Religion and Violence in Southern Thai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举方式将政权交还文职政府。这种政治上近乎规律性的变动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稳定性。但是泰国的这种政治不稳定外溢的可能性较小,难以成为大国干预的借口。因此泰国的族群政治和国内政治稳定大体属于中性因素。

简而言之,泰国的主要结构变量基本属于正向因素,但是在局势变量中存在对外安全需求这一强有力的负向因素,且两个维度中的正向因素没有形成明显的强互动关系。泰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度整体温和,无论是历史认知还是现实关系都不大会形成发展关系的阻力。但是由于美泰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通过深度经略泰国使其助力中国迅速发展也有一定难度。

(六)菲律宾

历史上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政治联系并不紧密,经济关系则主要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影响了中国的白银流动。1975 年中菲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虽然经历了格洛丽亚·阿罗约(Gloria Arroyo)政府时期的密切发展,但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上台之后,双边关系出现波动,在"南海仲裁案"时期更是跌入最低谷。在地区层面,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菲律宾认为中国试图主导南海及整个东南亚,甚至将中国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① 因此在双边层面同样以负向因素为主。这种认知也反映在民调数据方面,2015 年相比对美国有好感的 80%、对日本有好感的 65%,菲律宾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只有 19%。虽然近年来该指标有所回升,但相比之下仍处于较低位置。

上述认知波动与中菲两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密切相关。目前,菲律宾非法侵占了 8 个南海岛礁,在数量上仅次于越南。中菲两国关于南海岛礁的争端长期存在,2013 年阿基诺三世将南海问题提交海牙国际仲裁庭,引发"南海仲裁案",对中国南海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影响。② 2016 年海牙国际仲裁庭做出所谓仲裁,但继任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并未延续阿基诺三世的政策,而是选择搁置这一仲裁结果,寻求与中国协商解决。虽然中菲两国因南海仲裁引发的外交风波告一段落,但南海领土争端未来仍然是持续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变量。

自独立以来菲律宾就是美国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重要盟友。虽然美菲两国曾经有一些龃龉,美军撤出了苏比克湾,杜特尔特也发表过强烈的反美言论,但两国的盟友关系一直稳固。一旦与中国之间发生冲突,菲律宾必然寻求美国支持。领土争端问

① 《中国驻菲大使回应菲总统将中国比纳粹:完全不可接受》,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6/05/c_1115528413.htm,访问时间:2019 年 5 月 19 日。

② 关于南海仲裁案参见《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http://www.xinhuanet.com/world/nhzca/index.htm,访问时间:2019 年 5 月 19 日。

题与对美安全依赖之间形成强负循环效应,对于中国经略菲律宾而言是一个强有力的负向因素。

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还表现在菲国内政治稳定层面。由于国内分离主义的存在和政党腐败等问题的大量滋生,菲律宾的政治稳定性较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菲律宾的稳定指数长期处于负值,2015—2017 年的数值分别是-0.86、-1.38、-1.24。占人口 28.1%的他加禄人与南部穆斯林之间的族群冲突是导致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目前菲政府已经与南部穆斯林实现部分和解,但在短时间内这依然是影响国内政治的重要方面,外部大国在这一议题上作用有限。① 在菲律宾的选举政治方面,作为盟友的美国影响较大,相比之下中国影响力有限,因此整体上属于负向因素。

以上诸多负向因素也影响到中菲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数据显示,菲律宾对中国市场和资金的依赖一直处于低位:2008 年的依赖度为 11.13%,2017 年为 11.95%,十年期间起伏波动并不大。虽然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的经贸往来得到提升,但双边经济合作的水平较低。与中国相比,菲律宾对日本、美国的经济依赖度明显下降,2017 年数值分别为 16.47%和 18.77%。以此而言,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依赖某一大国。

华人华侨当前在菲律宾的影响并不显著。菲律宾华人华侨数量有限,历史上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曾经还发生过屠杀华人事件。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菲律宾与台湾地区保持了外交关系,对华人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但依旧出现了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② 目前,华人在菲律宾经济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华人政党。③ 由于菲律宾深受西方价值体系的影响,国内人口 80%以上为天主教徒,这一信仰和价值体系对于华人华侨的儒释体系兼容性较强,并不存在较大冲突。

总体而言,菲律宾在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两个维度中存在多个对华负向因素,并且在这些负向因素尤其是历史认知、领土争端和对美国安全依赖之间存在强互动关系,加强了负向效力。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将中国视为“威胁”,时常依靠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该问题上与中国对抗。这种状态不是杜特尔特政府所能本质改变的。菲律

① Angel Rabasa and Peter Chalk, “Muslim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pp.85-98.

② 李定国:《中菲建交和菲律宾华人的整合问题》,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39 页;王望波:《八十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69—73 页。

③ 朱东芹:《菲律宾华侨华人社团现状》,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第 89—95 页。

宾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更有可能妨碍中国的迅速发展。①

(七)马来西亚

古代中国在东亚居于主导地位,依托自身实力构建的东亚朝贡体系和贸易网络使得东亚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久远的历史联系。在这一网络中,马来西亚(马六甲)因地理区位在其中扮演着转运码头等重要角色。马来西亚在历史上与中国联系密切,明初明确认定为"不征之国",永乐时期还利用外交手段维持马六甲的独立。建交前后,由于受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双方关系以冲突为主。冷战结束后中马政治经济关系趋于缓和。马来西亚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以及中国的积极回应是中马政治经济合作明显增强的主要原因。② 在地区层面,马来西亚虽然也会对中国的主导地位发出质疑,但整体上将中国的迅速发展视为机遇而非威胁。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两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是对中国近年来发展及其带来的机遇的正面肯定。

民调认知中对华友好度较高在很大程度上与马来西亚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华人相关。相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华人占比较高,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之一。华人促进了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影响了中马关系。③ 在马来西亚,华人可以通过在政治选举中支持马华公会的方式行使政治权利。尽管马来西亚的宪法中存在对马来族群的照顾,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华人华侨虽然不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全部,但鉴于数量和影响力,其对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稳定有着决定性影响。从族群政治的视角看,华人华侨因素对于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有潜在的不利影响,族群政治引发的争端甚至冲突可能将中国卷入其中。因此,华人华侨因素在两国关系和马来西亚对华政策方面总体属于正向因素,但从族群政治影响的角度来看也有负向的一面。

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中的宗教化倾向可能恶化原有的族群生态关系。马来西亚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但目前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 61.3%,国家元首也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守护者。近年来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宗教化引人关注。④ 宗教政党的崛起以及试图恢复伊斯兰教法的诉求引发马国内政局的波动。目前来看,这一政治发展趋势尚未撼动马来西亚世俗化国家的身份,但有去世俗化的风险和可能

① Herbert Yee, *China Threat-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253-270.

② 廖小健:《冷战后中马关系的互动与双赢》,载《当代亚太》,2005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③ 庄国土:《经贸与移民互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兼论近 20 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原因》,载《当代亚太》,2008 年第 2 期,第 85—106 页。

④ Johan Saravanamuttu, *Islam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18-44.

性增大。

影响中马两国关系走向的因素还有南海问题。马来西亚也对南海提出了权利主张,这导致其同样感受到中国的压力。相对于越南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相对温和克制,领土争端问题与其他变量之间没有形成相互加强的负面效应。中国并不希望激化南海矛盾,马来西亚也同样重视南海区域的经济产出。马来西亚在南海争议地区已经进行了油气资源开发,该地区的油气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1/3,对于马来西亚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过分竞争只会对现有收益造成损失。因此,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持较为温和的态度,并未完全倒向其他大国寻求领土安全保护。未来中马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① 这一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负向因素。②

与政治、安全关系相比,中马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提升,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和资金来源国。目前中国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经济对中国市场和资金依赖度较高。2016 年,中国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力开始超过日本。2017 年,马来西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达到 30.43%。近年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放缓也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有关。③ 在马来西亚,对华经济依赖为对华正向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在马来西亚的结构变量中,族群政治为负向因素,宗教哲学为中性因素,其余为正向因素。在局势变量中,领土争议和经济依赖分别为负向和正向因素,其他为中性因素。负向因素间尚未形成较强的互动关系,而正向因素间的互动正在加强。华人华侨因素的双重属性体现了马来西亚的“两面性”特征,马方仍然存在滑向中国对立面的风险。考虑到马来西亚在东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积极争取应是中国经略马来西亚的策略选择。

(八)新加坡

新加坡是除中国之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与马来西亚一样,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华人华侨与其他族群关系的问题。新加坡被认为是“绿色海洋中的小红点”,这表明了其在国家生存上的脆弱性。新加坡在内政和外交方面

① Benny T. C. Gua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undrum: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and Malaysia's Preferred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8, No.3, 2017, pp.373-395.

② 关于马来西亚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参见 Adam L. K. Wey, “A Small State's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Strategic Respon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ebacl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36, No.5, 2017, pp.392-399。

③ Cheong K. Cheok and Wang Qianyi, “China's Growth Deceleration: A New Normal for Malaysia To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8, No.2, 2017, pp.199-219.

始终要注重协调邻国和国内马来族群的利益。[①] 族群政治对新加坡的影响是持续性的,这种影响表现在其与中国建交的过程中。李光耀(Lee Kuan Yew)曾经指出,对于新加坡而言,周边邻国是其生存的关键,因此马来西亚和印尼对新加坡影响力很大。[②] 根据这一逻辑,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关系越是密切,两国的政治提升空间就越有限。在新加坡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情况下,如果其在政治上也倒向中国,那将是印尼和马来西亚难以接受、同时也会极力防范的局面。此时弱小的新加坡极有可能面临国家安全威胁。因此,尽管新加坡华人在中新两国经济发展中的纽带作用十分明显,但华人族群在政治维度上仍然是负向因素。

新加坡的上述考虑一方面显示了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地区小国的生存策略。新加坡不希望任何大国主导地区秩序,当然也不希望看到大国之间的冲突。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持大国地区影响力的平衡是其确保国家生存的基本原则。因此,当美国弱化在东南亚的存在而中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时,新加坡就开始极力寻求与美国合作。李光耀将美国视为“仁慈的霸权国家”,新加坡也被认为是美国的准盟友。[③] 新加坡对美国开放樟宜军事基地就凸显了两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新加坡并不乐见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地区秩序的主导,更愿意与美国等国家共同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也是应对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战略选择。[④] 在新加坡,其对外安全需求对于中国而言是强负向因素。

上述两个负向变量的强互动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很难经略新加坡。国内外族群政治和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强互动使得新加坡在未来更有可能成为积极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享有共同的儒家文化,两国也不存在领土争议,在历史认知、宗教等方面基础也较好,但这都不足以撼动新加坡为了维护国家生存而选择的外交策略。

新加坡的小国平衡心态也反映在与大国的经济关系上。中新两国的经贸关系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目前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新加坡对外依赖程度最深的国家,但与美国的差距不是很大。2017 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对中国的依赖度为 21.71%,对美国

①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p.159-185.

② Michael Leifer,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③ Euan Graham, “Southeast Asia in the US Rebalance: Perceptions from a Divided Reg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5, No.3, 2013, p.317.

④ Michael Leifer,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的依赖度为 17.9%。中国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中并不拥有主导性影响,美国在整体上依旧保持了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因此这一指标体现为中性。

在新加坡这一案例中,长时段结构维度中的族群政治与中时段局势维度中的对外安全需求均为负向因素,两者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而正向因素之间的互动程度有限。虽然新加坡是华人占主体的国家,但国家的生存利益决定了新加坡的外交只能围绕自身国家利益展开。因此新加坡更有可能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联合其他域外大国制衡中国。

(九)印度尼西亚

印尼现有的政治版图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下聚合而成的一个国家。荷兰的殖民遗产导致印尼内部的宗教、族群冲突时有发生,亚齐和马鲁古的安汶就是典型案例。① 随着印尼经济的发展,族群政治开始更多地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性。② 由于国家的脆弱性和族群政治的存在,长期以来印尼的政治稳定性较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尼三年来的稳定指数都是负向,这为中国经略印尼增加了难度。但是由于印尼政府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各大国对印尼的争取,某一外部大国干预其国内政治的机会和能力较为有限。

就双边关系而言,中国和印尼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两国历史上往来频繁,古代印尼室利佛逝、满者伯夷等地区大国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独立之后,苏加诺(Bung Sukarno)领导下的印尼开始寻求地区大国地位。由于印尼的这一需要,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一度十分密切。1965 年"9·30"政变之后,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政权一改苏加诺的外交政策,中国和印尼的双边关系走向低谷,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恢复双边关系。在地区层面,印尼对于"朝贡体系"同样心存警惕。③ 从民调数据来看,印尼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处于中等水平。

华人华侨因素是时常搅动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重要变量。目前华人华侨在印尼总人口中的占比虽然不高,仅有 1.2%,但印尼整体人口基数较大,也是东南亚华人最多的国家。历史上印尼也是排斥华人最为激烈的国家。从 1740 年荷兰统治时期的"红溪惨案"到 1998 年的反华骚乱,华人华侨问题在印尼国内和双边关系中更多是负

① 庄礼伟:《印度尼西亚社会转型与族群冲突——亚齐民族分离运动个案分析》,载《世界民族》,2005 年第 1 期,第 29—35 页。

② Taufiq Tanasaldy,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Leiden: Kitlv Press, 2012.

③ 马丁·斯图尔特·福克斯:《东南亚和中国:历史和文化对形成未来关系所起的作用》,载《南洋资料译丛》,2005 年第 1 期,第 13 页。

向因素。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华人政策出现较大改善,华人在两国复交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① 但近年来,印尼政治选举中的“钟万学事件”和对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华人血统的关注,都显示出华人华侨因素依旧是影响印尼国内政治及其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因此,在印尼华人华侨因素对中国而言总体呈现两面性,其滑向负向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印尼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穆斯林人口占比达 80%以上,近年来政治伊斯兰还在加速发展。② 在近期的选举中,印尼宗教政党的得票率在不断上升,反映出宗教信仰在印尼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整体来看,宗教政党的崛起和影响力提升尚未打破印尼的世俗化状态,也并不必然带来与中国的疏远和冲突,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在这一维度上密切双边关系的空间有限,属于中性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中国和印尼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同样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从中国和印尼双方的官方表述来看,两国都否认在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在纳土纳群岛及其专属经济区上,印尼一直对中国保持警惕。印尼认为,纳土纳群岛及其附属地区是印尼毫无争议的领土和专属经济区。但这一地区部分与中国的九段线划界有所重叠。目前中国和印尼虽然都愿意保持现状,但领土和权利主张存在重叠的现实是未来两国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印尼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第二轨协商的重要组织者。③ 作为东盟潜在的领导者,印尼自身区域领导者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尼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海争端中的策略选择。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不希望任何域外国家主导东南亚地区。因此,在印尼领土争议变量属于负向因素,对外安全依赖为中性因素。

与政治和领土方面时有争议不同,近年来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关系不断提升。长期以来日本是印尼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资金来源国。印尼对日本的依赖在 2012 年达到顶峰,依赖度达 57.46%。同一时期,印尼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只有 13.15%。但是到了 2017 年,印尼对中日两国的经济依赖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日本的依赖度下降到 28.14%,对中国的依赖度则上升到 21.64%。这一数据变化显示出日本已然丧失了在印尼经济的主导性影响,后者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上升。④ 因此,在印尼对外经济依

① Siew-Min Sai and Chang-Yau Hoon,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7.

② Ishtiaq Ahme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1, p.136.

③ Evan A. Laksmana,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donesia's Approach to the Tribunal Ruling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8, No.3, 2016, pp.382-388.

④ Christian Chua, *Chinese Big Business in Indonesia: The State of the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赖属于由中性趋于正向的因素。

综上所述,在长时段结构性变量中,除了华人华侨因素具有“两面性”之外,印尼的各指标均呈现中性。在中时段局势性变量中,只有领土争议为负向因素。但是,印尼的几项中性因素均存在“两面性”或恶化可能,华人华侨、宗教哲学等变量均有可能转为负向,对外经济依赖可能趋于正向。考虑到印尼自身定位以及印尼国内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在增强,有可能出现结构、局势两个维度中变量的负循环互动。因此,印尼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可能会扮演具有“两面性”的角色,助力和阻碍可能并存。鉴于印尼在地区的重要地位,中国应针对性地主动建构双边关系,采取积极的争取策略。

(十)文莱

1984 年文莱获得独立地位,随即加入东盟。由于实行限制外来移民入境和入籍的政策,华人在文莱的总人口中占比有限。历史上文莱与中国之间保持着官方和民间往来。据史料记载,明永乐时期渤泥国王曾亲率使团访问中国,在归途中逝世,最终以王族之礼葬于南京。1991 年文莱与中国建交之后,曾经专程到南京察看渤泥国王墓。① 文莱与中国从未发生过战争,建交以来在外交层面也没有尖锐冲突。但从地区层面而言,文莱依旧存在对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的担忧。不过民调数据显示,文莱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 27%,相对于美国的 9%,文莱对中国的认知相对积极。但是,这一认知尚难以进一步推进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宗教哲学、领土争议和对外经济依赖等要素延缓、阻碍了该进程。

在文莱,对中国而言宗教哲学是长时段结构中的负向因素。文莱与中国虽同处东亚地区,但往来有限,两国在宗教和日常哲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佛教在传统中国宗教信仰中影响力较大,儒家的理论体系在哲学价值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文莱则是典型的伊斯兰国家,2014 年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Haji Hassanal Bolkiah)开始实行传统的伊斯兰教法,成为国际社会中为数不多的采用伊斯兰教法的国家。② 伊斯兰教法的采用使得文莱的宗教哲学体系发生很大变化,对其他宗教哲学体系的兼容性可能显著下降,不利于不同宗教哲学体系之间的往来、交流和沟通。这对于中国而言属于负向因素。因此,当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寻求与文莱更深层次合作时,这一要素可能成为障碍。

---

① “Brunei Darussalam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2006,” http://www.mfa.gov.bn/Publications/news_digest2/files/final%20pdf.pdf,访问时间:2019 年 2 月 16 日。

② 《文莱实施伊斯兰刑法 5 月份正式生效》,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05/c_126464074.htm,访问时间:2018 年 10 月 30 日。

文莱的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出口,日本是其主要出口对象,也是文莱外部投资的重要来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为资源稀缺的发达国家,日本对石油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文莱对经济发展资金的需要相契合,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两国皇室之间的往来也有助于友好的经济关系的维系。从经济数据来看,虽然文莱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呈下降趋势,但日本在文莱经济发展中依旧占据主导性的影响地位。2008 年文莱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一度高达 70%以上,到 2017 年虽下降到 30%左右,但这一数字依然相当可观。近年来中国虽然大力增强与文莱的经贸往来,但对文莱的总体投资和双边贸易额上升幅度有限,2017 年双边投资和贸易额仅占文莱相关总额的 4%左右。文莱与中国之间有限的贸易和投资尚不足以带动两国关系发生实质性、整体性提升。① 鉴于日本在文莱经济中的主导性影响地位,在文莱对外经济依赖对中国而言属于负向因素。

领土争议也是影响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文莱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国家之一。目前文莱宣称对南海一处岛礁拥有主权,两国在专属经济区划界方面也存在争议。但相比菲律宾和越南,文莱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并不尖锐,尚未上升为争端或冲突。文莱虽然提出了对岛屿主权和专属经济区权利的声索,但并未像其他国家一样占据声索岛屿。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文莱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愿意与中国保持相对一致的立场,主张通过协商和双边渠道加以解决。② 但正如上文所言,领土争议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文莱也不会放弃对南海岛屿和专属经济区的声索。因此一旦领土争议激化,两国关系就将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分析,文莱在长时段结构和中时段局势两个维度都存在对华负向因素,但两个维度的负向因素之间尚未形成带来明显社会影响的互动关系。宗教哲学的差异并未激化两国在南海的领土争议。文莱可以被归为对中国和平发展无害但同时助益也较为有限的国家。

五 结论

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与中国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有必要对东

① Mark Cleary and Shuang Yann Wong, *O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in Brunei Darussal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② 《王毅谈中方和文柬老三国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四项共识》,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4/23/c_1118716643.htm,访问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

南亚国家进行差异化经略。至于如何差异化经略、差异化的标准又是什么，现有研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通过将影响中国经略东南亚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层次划分，本文构建了一个以长时段结构变量和中时段局势变量为轴的分析框架，以不同层次变量的自身属性和层次间变量互动的强弱为标准，实现了对东南亚国家的理论分层和排序。长时段结构变量是对双边关系有着间接、持续性影响的要素，包括对华历史认知、宗教哲学、族群政治和华人华侨。中时段局势变量则更多是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约束性条件和关系，主要包括领土争议、国内政治稳定性、对外安全需求以及对外经济依赖。两个层面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对中国在该国的经略难度和可行性产生循环效应，最终决定其在中国的周边经略中的层次。

通过考察东南亚十国长时段结构变量和中时段局势变量的属性特征以及两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强弱，我们可以对东南亚十国具体分类和排序。总体而言，中国可经略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而需要适度防范和争取的国家集中在海上东南亚地区。

表 1　东南亚国家变量属性及互动关系

国家 / 变量	越南	缅甸	老挝	柬埔寨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文莱
历史认知	**负**	中	**正**	**正**	正	**负**	正	中	中	中
华人华侨	中	中	中	中	正	中	正	正	两面	中
宗教哲学	正	正	正	正	正	中	中	正	中	负
族群政治	中	正	中	中	中	中	负	**负**	中	中
	⋮	‖	‖	‖		⋮		⋮		
领土争议	**强负**	中	中	中	中	**强负**	负	中	负	负
政治稳定	中	正	中	正	中	负	中	中	中	中
安全需求	中	中	中	**强正**	强负	**强负**	中	**强负**	中	中
经济依赖	中	正	正	正	中	中	正	中	中	中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加黑字体为参与互动的变量。实线为“强正循环效应”，虚线为“强负循环效应”。

鉴于东南亚十个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我们进一步对不同类别的国家做出必要的排序（如表 2 所示），从而实现对多样化的东南亚国家的分层处理，为制定差异化经略东南亚地区的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表 2 中国经略东南亚国家类别及排序

第一类:重点深耕的国家	缅甸、柬埔寨、老挝
第二类:努力维持的国家	泰国、文莱
第三类:积极争取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第四类:适度防范的国家	越南、新加坡、菲律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可助益中国发展的国家包括缅甸、柬埔寨和老挝。这三个国家无负向指标,正向指标大多具备,其中部分属于强正向指标。这三个国家的经略可行性强、难度小、收益大,应努力将它们打造为周边支点、重点深耕。对于这类国家,中国应该保持并不断深化在“结构”和“局势”两个层面的强正向因素,防止出现强负向因素,更加注重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更好地形成强正循环效应。具体而言,中国应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以及安全、政治和经济领域给予强有力的必要支持,保持这种战略优势的可持续性。

对中国发展无害但帮助有限的国家包括泰国和文莱。这两个国家以中性因素为主,要么只存在单一层面的负向指标,要么虽然存在两个层面的负向指标,但它们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互动关系。由于这一类国家争取成本过高,深度经略难度较大,而且争取不到也损害有效,所以在中期内不需重点经略和大力争取,积极维持双边关系即可。其中重点在于维护现有的正向因素,防止两个维度的负向因素产生强互动关系。在这一类国家的深层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对中国的敌视和反对,中时段局势性变量进一步演化为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不大可能滑向中国的对立面。从深度经略的角度考虑,试图扭转这一类国家的负向因素难度较大,中短期内很难实现。相对文莱而言,泰国在两个层面的正向指标之间存在一定互动,具有一定经略空间,但在重点排序和经略力度方面应置于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之后。

经略不当可能形成阻碍、经略得当能够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助益的“两面型”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在两个维度中正负向因素大致相当,负向因素之间尚未出现强互动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主动建构双边关系、争取对方改善对华政策的空间较大。由于印尼和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需要中国积极争取和有针对性地精耕细作,防止两国滑向对立面,尽可能挖掘其中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因素。理论上,中国应该尽可能地推动两个维度的中性变量向正向因素演变,避免刺激和激化两个维度的负向因素。对于在两个维度中都存在正向因素的马来西亚,中国应进一步推动两个维度间的强互动关系。在对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略中,应引导两个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降低消极因素的影响。

中国在发展中需防范风险的国家包括越南、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在“结构”和“局势”两个维度都存在负向因素,并且负向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强化关系。与此同时,两个维度中都缺少正向因素。对于此类国家,中国需要防范可能的风险,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深层经略的可行性小、难度大。具体而言,由于两个维度之间强有力的负循环效应,这一类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或者提防心态是长期性的,背后拥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支撑。因此在短时间内,中国难以利用自身资源改变这一类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相反,由于局势性变量可能引发的突发事件或危机,负向因素之间的互动还可能持续增强,特别是在民族主义越发盛行的越南和菲律宾更容易如此。对于这一类国家,在维持必要的国家间关系的同时,中国应保持警惕。

对东南亚国家的经略应当由突出多边一体化合作转向首先立足双边经略,这要求中国逐渐淡化对东盟的整体经略范式,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分层次、精细化的双边经略。合理的分类和排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差异化策略对于中国提升周边经略质量十分重要。在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合理配置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资源从而实现最优平衡是稳定周边的重要保证,也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该地区推进合作特别是建设“一带一路”和落地实施“澜湄合作机制”的关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分析的变量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与中国作为区域大国的经略行为具有相关性。这意味着东南亚国家的分类与排序也会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本文呈现的只是静态分层与排序,揭示的是经略东南亚各国的可行性与难度以及背后的有利条件或症结,目标在于为中国差异化经略该地区、因势利导和“对症下药”提供参考。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分层和排序将是固定不变的。中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自身努力调整和改善不同因素特别是其中的局势性变量,比如改变对象国的安全和经济不对称依赖关系、妥善处理领土争议等。此外,在差异化经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大国间竞争和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东南亚国家之间历史、地缘、经济以及文化因素交错的复杂关系同样会影响中国经略策略的实施,这也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截稿:2019 年 11 月　编辑:肖　河)